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二辑·第三卷)

[隋唐] 隋唐五代
(公元 581 ~ 公元 960)

主流教育思潮和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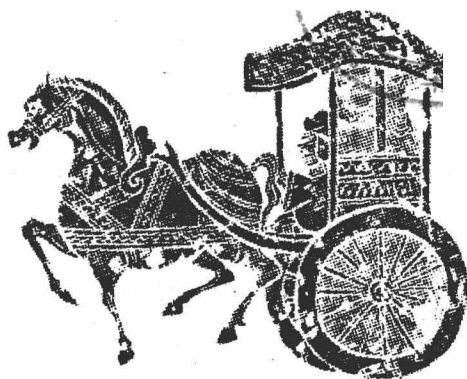


(第二辑·第三卷)

[隋唐] 隋唐五代

(公元 581 ~ 公元 960)

主流教育思潮和教育论著选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二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5

ISBN 7-80135-738-8

I. 中... II. 北... III. 教育名著-作品综合集-中
国文学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7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二辑

[隋唐]隋唐五代主流教育思潮和教育论著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1/32 印张:195 字数:5066千字

ISBN 7-80135-738-8

全二十册定价:526.00元(册均26.30元)

(ADD: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10号信箱)

P. C.:100024 Tel:010-65477339 010-65740218(带Fax)

E-mail:webmaster@BTE-book.com Http://www.BTE-book.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二辑·第三卷

[隋唐]隋唐五代主流教育思潮和教育论著选读

上 篇

隋唐五代教育及教育思想

隋唐五代教育概述	(1)
(一)帝国初创与隋文帝文教政策的摇摆	(2)
(二)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与儒术重振	(6)
(三)五代的衰落与印刷术的发明	(33)
(四)隋唐道统的复兴	(34)
陆德明、颜师古、孔颖达与唐初经学教育	(39)
(一)陆德明	(39)
(二)颜师古	(41)
(三)孔颖达	(47)
唐代的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	(50)
(一)医事制度	(50)
(二)医学律令	(53)
(三)医学教育	(56)
王通的教育思想	(59)
(一)安邦育人	(60)
(二)仁义为本、礼乐为先	(62)
(三)穷理尽性,乐天知命	(64)
(四)知之、行之、安之	(71)

(五)学无常师,唯道所存	(75)
孔颖达的教育思想	(76)
(一)生平与学术活动	(76)
(二)论教育作用	(78)
(三)论教育内容	(81)
(四)品德修养思想	(83)
(五)教学方法论	(85)
五代的教育	(86)
(一)五代的学校教育	(86)
(二)五代的科举制度	(91)

下 篇

隋唐时期教育论著选读

隋文帝(杨坚)	(97)
劝学行礼诏	(97)
劝学诏	(98)
施用雅乐诏	(99)
简励学徒诏	(99)
令州县搜扬贤哲诏	(100)
牛 弘	(101)
上表请开献书之路	(101)
何 妥	(104)
定乐舞表	(104)
李 諤	(106)
上书正文体	(107)
隋炀帝(杨广)	(108)

求贤兴学诏	(109)
令十科举人诏	(110)
文武职事以才授诏	(110)
隋 书	(111)
儒林传序	(111)
唐高祖(李渊)	(113)
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诏	(114)
京官及总管刺史举人诏	(114)
置学官备释奠礼诏	(115)
兴学敕	(116)
幼童通经赏以不次诏	(116)
魏 征	(117)
对大乱之后大可致化	(117)
群书治要序	(119)
谏太宗十思疏	(120)
诸王善恶录序	(121)
颜师古	(122)
上汉书注序	(123)
策贤良问五道	(123)
唐太宗(李世民)	(126)
置文馆学士教	(127)
崇文篇	(128)
崇儒学(节选)	(128)
尊敬师傅(节选)	(129)
教诫太子诸王(节选)	(130)
帝范后序	(132)
采访孝悌儒术等诏	(133)
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	(133)

搜访才能诏	(134)
禁经序	(135)
笔法论	(135)
指法论	(136)
笔意论	(136)
论崇笃实诏	(137)
颁示礼乐诏	(137)
令州县行乡饮酒礼诏	(138)
金 镜	(138)
长孙无忌	(143)
先圣先师议(节选)	(143)
律疏议序	(144)
刘祥道	(146)
陈铨选事疏	(146)
魏玄同	(148)
论选事疏	(149)
唐高宗(李治)	(152)
令京司长官上都督府诸州举人诏	(152)
补授儒官诏	(153)
访习礼乐诏	(153)
令雒州举人诏	(154)
条流明经进士诏	(154)
营造孔子庙及学馆诏	(155)
武则天	(155)
以八科取士诏	(156)
改元载初赦(节选)	(156)
停试糊名考判敕	(157)
臣 轨	(158)

臣轨上(五章)	(159)
臣轨下(五章)	(167)
唐中宗(李显)	(174)
令宗室子弟蕃王及可汗子孙愿入学者附学习业诏	(175)
令入学行束修礼敕	(175)
集学生制	(175)
唐睿宗(李旦)	(176)
申劝礼俗敕	(176)
皇太子国子监释奠诏	(178)
唐玄宗(李隆基)	(178)
将行释奠礼诏	(178)
诸州举实才诏	(179)
命张说等两省侍臣讲读敕	(179)
令贡举人勉学诏	(180)
令蕃客国子监观礼教敕	(181)
令礼部掌贡举敕	(181)
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	(181)
禁策判不切事宜诏	(182)
劝选人勤学业诏	(182)
皇太子诣太学诏	(183)
诸州置医学博士敕	(183)
求儒学诏	(183)
考试博学多才道术医药举人诏	(184)
令两监生徒赴学诏	(184)
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	(185)
岁初处分德音	(185)
每年铨量举送四门俊士敕	(187)
亲祀东郊德音(节选)	(187)

追赠先圣为文宣王诏	(188)
亲试四子举人敕	(189)
命两京诸路各置玄元皇帝庙	(189)
分道德为上下经诏	(190)
禁止生徒问难不经诏	(190)
孝经注序	(191)
颁重注孝经诏	(192)
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敕(节选)	(192)
帖经之弊须厘革敕	(193)
榜示广济方敕	(193)
天宝七载册尊号赦(节选)	(193)
听国子监诸生还乡习读敕	(194)
唐代宗(李豫)	(194)
选集贤学士敕	(194)
崇太学诏	(195)
唐德宗(李适)	(196)
命举选人习开无礼诏	(196)
两馆学生宜据式考试敕	(197)
条流习礼经人敕	(197)
颁广利方敕	(198)

隋唐五代教育概述

隋唐五代的教育包括公元581年至公元960年的长达370余年的教育历史。这一历史时期,既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教育最有成效的时期。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为古代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奠定了古代社会后期重视文教、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使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国家法定的意义和保障。

第二,适应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帝国的形成和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以儒学教育为主体的层次严密,上下贯通,主辅分职,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完整的学校体系,并且从教育政策、方针、目标、设施、教材、教师、学生各方面给予了系统的保障。尤其是私学和书院的发展,作为古代国家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为教育力量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古代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了较为客观、公正和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人才考察制度,使社会的人才选拔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选人用人有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形成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学的风气。

第四,建立和实施了系统的实科教育体系,使古代教育具有了多元化的结构和功能,对于当时社会物质文明走向鼎盛发展,发挥了实际作用。

第五,在教育思想上,适应儒学思想的第二次变革,在总结前人

的理论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经学教育思想向理学教育思想转化的方式、途径及其理论形式,初步提出了理学教育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为宋以后理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了理论准备。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而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隋唐五代三百多年时间,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和昌盛。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维护其统一的政治统治,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基础和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内,都自觉地采取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些改革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物质条件,使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集中的、等级分明的教育体制和管理体系;要求有统一标准的教育内容和配套成龙、自成体系的教育方法等等,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客观地促进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古代社会的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达到了一种相当的和谐和统一。

(一) 帝国初创与隋文帝文教政策的摇摆

隋承北周而立国。北周晚期外戚隋国公杨坚总揽朝政,公元581年废周静帝,立国于长安,改元开皇。公元589年灭南朝陈国,从此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三百多年的战乱和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虽然隋朝国祚太短,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但它在客观上为唐朝的继续改革探索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构思了基本的思路

和规模框架。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在政治体制上,隋的中央官制废除了北周所置的六官,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地方官实行州县两级制。这一措施不仅裁汰了一些冗官,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政府节省了开支,而且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政治的统一。军队管理实行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隋书·高祖纪》),这一措施不仅加强了政府的武装力量,而且将军事统率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支持了中央权力的上升。此外,宽简刑制,缓和了社会矛盾。用科举制度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打破了门阀大族把持选举的局面,把选举权集中到中央吏部,这不仅削弱了地方士族的势力,加强了皇权,而且也利于当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在经济上,隋唐继续实行均田制,一方面限制了地方贵族对土地的兼并和地方豪族势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和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消除了南北经济交流的障碍,逐渐形成了东西二京两个最大的商业都市。西京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隋书·地理志上》)。东京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市周六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七十二行,三千余肆。莞市齐全,遥望一加,榆柳交荫,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大业杂记》);北市通远,周围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同上),国内边疆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都曾入市交易,可见当时商业贸易是相当繁荣的。

伴随着政治经济的改革,隋朝统治者在文教政策上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由于历史的大转轨,对新旧意识形态的选择和新旧意识形态本身的转化以及适应新社会的功能所必需的调整,隋朝的文教政策在肯定传统儒家学术的基本思路的前提下,曾出现过某种动摇和怀疑。

一方面,在肯定儒学的同时,对佛、道二教也并不放弃。隋文帝杨坚幼年时寄养在尼智仙的尼寺里,十三岁才还家。周武帝灭佛,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大力提倡佛教。实质上,隋文帝已经认识到佛、道、儒三教可并用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文帝即位之初,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即“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并由官府写经置寺内,风靡全国。于是“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百倍”(《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抵东汉迄南北朝时期,是其被中国文化吸收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翻译经典,其次才是阐发义理,而隋唐时期,是佛教的融化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主要贡献是创立宗派(学派),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哲学。这一工作随着隋文帝对佛教的提倡而逐渐开始了。

道教尽管在争夺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隋统治者对其基本采取调和的态度,不仅儒道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和儒学也可以调和。隋炀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

另一方面,对儒学的态度也时冷时热,时扬时抑。隋文帝杨坚认识到,三教虽可并用,但作用不同,要使人民顺从地遵守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服从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训练从政的官吏,便要依靠儒学。故儒学又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推崇。

自从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学定于一尊,曾促进了儒学教育的蓬勃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佛教和道教相继兴起,儒学一度衰微。隋统一中国后,在三教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儒学开始有所复兴。文帝即位,曾采纳牛弘建议,广泛征集儒学经典。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完毕,原书归还本主,由此搜得不少异书。灭陈后又得一批江南图书。分散的书籍集中在朝廷。当年周武帝时,积累书籍已满一万卷,灭齐得新书五千卷。如今共有三万七

千余卷,含重复本达八万卷。隋文帝使人总集编次,称为“古书”。选工书之士,补续残缺,写出副本与正本同藏宫中。隋炀帝时,又将儒学经典加以整理分类,分甲、乙、丙、丁四组,分统于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来史籍分类的正统方法。炀帝将所有书藏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乙,西厢藏丙丁。殿后起二台,东为妙楷台,藏魏以来书家手迹;西为宝台,藏古画。

隋朝又借全国统一,积极促进南北儒学的合流,使儒学中的“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不同特点逐渐融合。这是经学教育的一个重大改革和发展。

由于隋文帝积极振兴教育,一度出现了学术与文化的昌盛景象:

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饬悬问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黉核。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

同时,隋文帝还注意搜罗儒术人才,用重礼聘请,许以高官厚禄,把著名的儒士都集中于京都。

文帝一面崇儒,一面兴学,自京都至州县均设学校。文帝还亲至国子学参加释奠礼(开学典礼),奖励国子生,考选国子生为官。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下令劝学,强调设学施教是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进行礼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589年统一全国之后,又令所有学校都要勤训导、严考课。

但终隋之世,儒者的地位在统治者心目中始终没有能真正提高。《隋书·儒林序》说,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原因是“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开皇初

年,隋文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百余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由于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始终未得解决。此后,大概不再举行考试,儒生的出路便几乎断绝。隋朝最著名的儒生仅刘焯,刘炫二人。刘焯因计较束脩(学生交纳给老师的学费),声名不佳;刘炫曾借隋炀帝购求书籍之机造伪书百余卷,骗取赏物。所谓巨儒必鄙俗,不受重视,可见一斑。文帝晚年,崇佛更甚,甚至排斥儒学,为石虎、梁武帝、齐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为,使佛教在短短的时间里几成国教。儒学和佛道的地位相距愈远。公元600年,隋文帝诏令严禁毁坏、偷盗佛道两教的神像,而第二年却藉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一处,学生名额七十。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但就在当天,却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是公开助佛排儒。隋炀帝恢复学校,但仍并不改善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许多生徒参加窦建德的瓦岗军,足以说明朝廷对儒生的态度。隋文帝晚年的助佛教反儒学,比起南北朝君主助一个宗教反另一个宗教来,其结果更坏,它使隋王朝丧失了正统的意识形态,加速了统治基础的崩溃。后来的唐王朝由此认识到,三教都是可为统治秩序服务的,同时并存,各有其用,不能偏废。

(二) 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与儒术重振

1. 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改革

唐朝在隋末的混乱中以反隋而立国,高祖李渊本也为隋朝命官,于公元618年在长安称帝,又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在隋朝各项未竟的改革事业基础上,继续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改革,先后出现了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时期的“开元之治”使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强盛而先进的文明国家。

所谓唐承隋制,唐朝各项集权政治的措施,多是继承隋朝而加以

变化。唐初帝王特别是唐太宗,认识到“水能载舟,亦也覆舟”的道理,以隋为鉴戒,力求除去隋朝的弊制,推行了一些革新的政策。在官制上,沿袭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更加完备,地方改隋炀帝时的郡县为州县两级,设州刺史和县令。贞观设道,开元间分天下为十六道,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兵制上,亦沿袭隋制,使府兵制与均田制更进一步结合,既保证了从均田制下征调兵源,减少国家常备军费,又加强了中央的军事控制力量,同时几次修订律令,宽简刑法,扩大了统治基础。在官吏选拔上,唐王朝完整地继承并发展和完善了科举制度,使中央集权得到有效的组织保证。

在经济上,唐朝继续颁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这一措施巩固了府兵制,又使国家政权的纳税基础不断扩大,垦辟了不少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同时,输庸代役,也多多少少减弱了个体农民对国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手工业,如纺织业、造船业、矿冶业、造纸业,瓷器业、制茶业、制盐业等等都有了显著进步,为商业的发达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外,唐王朝也采取了一些发展商业的措施。如发展交通,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等,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仅以长安为例,有东西二市,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奇珍,皆所积集。”(《长安志》卷八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西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韦述《两京新论》卷三)。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商业极盛。对外贸易也相当发达,如西北陆地,由西城通往西亚、欧洲各国,有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东南海路,以广州为最大的贸易港,东南亚各国如林邑、真腊、河陵、宜利佛逝,以至狮子、波斯、阿拉伯等国家,都到广州做生意;在东方与日本、新罗的贸易更为频繁。由于唐王朝的各种努力,唐中叶以前近百年间,社会经济出现了十分繁荣的景象,所谓自贞观后,“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